

# 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周 强 周英慧\*\*

**摘 要：**民众的政治态度或曰民意对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意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做过大量的论述，其观点之一认为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然而，传统理论对于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资产专用性可以理解为一种资产在短期内从现有形态转变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的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阐释了资产专用性会如何影响民众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决策的态度，发现拥有专用性资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和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这是因为组织稳定和决策过程更具参与性分别会保持和降低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本文将房产视为专用性资产的典型，利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了理论假说。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政治态度；社会稳定；民主决策

**Abstract:** Public opinions or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people are critical to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产属性对中国社会利益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5BZZ027）的研究成果。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调查项目负责人为沈明明、杨明、严洁。

\*\* 周强，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等；周英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political process and public policy-making, studies on such topics constitute a fertile area for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theorie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have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asset ownership. They argue asset owners tend to favor social stability and less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However, traditional theori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asset specificity,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of an asset to convert in short term from its current form to cash, which has the highest mobility. We elaborate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bout how asset specificity can affect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predict that ownership of specific assets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itizens' prefere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while significantly decrease citizens' support for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Using 2017 Beijing Area Study (BAS) survey data, we are able to confirm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Key words:** Asset specificity, Political attitudes, Social stability,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 一、导言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sup>①</sup>

2000多年前的孟子敏锐地观察到普通人在“有”或“无”恒产的两种状态之下，将有不同的态度及行为。在他理想的仁政之中，假若君王可以使得普通人保有并享用“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的话，那么国家将几乎达到儒家所向往的完美境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sup>②</sup>

经过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到今天，孟子的政治观依然可以对现代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孟子的民本思想提示我们，为了实现更优的国家治理，除了从作为治理者的国家机器的角度探寻提高行政

① 《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4页。

② 《孟子集注卷五·梁惠王章句上》，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4页。

效率、减少腐败和浪费、优化管理制度等举措之外，还可以从作为被治理者的社会成员的角度进行反转思维。要达到以更合理的社会成本实现多数社会成员服从和配合国家治理，我们有必要对于社会成员普遍性的政治态度有更深的认识。政治态度由何而来？它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对于不同议题的政治态度有何区别，原因是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之中，孟子对于“有”或“无”恒产的不同后果的观察给了我们启发。本文认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成员们拥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所拥有资产的专用性程度高低共同塑造，资产所有权和资产专用性能够以各自独立的路径深刻地影响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稳定性，以及财富再分配政策的态度。

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已经就资产所有权对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影响做过透彻的论述，简言之，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然而，传统理论对于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资产专用性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资产在短期内从现有形态转变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的能力。例如在短期内，企业家拥有的机器厂房和金融家拥有的银行债券，各自的变现能力是不同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推断出的有产者的政治态度实际上隐含了“高”资产专用性的假设，即资产无法在短期内变现时，有产者会更倾向于社会的稳定和更少的财富再分配。然而当他们的资产专用性逐渐减弱时，有产者对于社会稳定的偏好将不再那么强烈，并且对于财富再分配的包容心可能会上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出资产专用性影响政治态度的理论。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将简要论述政治态度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说明政治态度可能会显著地影响政策。然后引入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分析资产专用性和社会经济地位会如何影响政治态度。接下来的理论部分将分别论述资产专用性如何通过机制影响民众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主决策的态度。将房产视为专用性资产的典型，本文的理论可以引申出两个可检验假说：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假说二，拥有房产会显著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第三部分利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了这两个假说。第四部分为总结。

## 二、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及假说

### (一) 政治态度与公共政策

民意或者说民众的政治态度对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民意与政治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政治体之中,政治人物需要获取政治制度规定的选民群体内多数人的支持以获取权力。<sup>①</sup>梅尔策(Allan H. Meltzer)和理查德(Scott F. Richard)利用中位选民理论研究政府的规模和再分配政策的程度。他们提出,当合法选民的资格放宽时,中位选民将位移到较低收入、较低劳动生产率的群体,从而导致再分配加大和政府的规模扩张。<sup>②</sup>迈达(Anna Maria Mayda)和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两组跨国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sup>③</sup>,他们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可以正面地影响各国民意中对于自由贸易政策的偏好,这些因素包括个体层面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个体是否受雇于非贸易部门、个体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体较少地牵绊于邻里事务,和具有较少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sup>④</sup>对美国政治研究形成的一般共识包括,共和制的美国政体要求立法或行政机构的政治代理人由民众通过定期的投票选举产生。而即使在选举后,政策变动仍然会相当程度上反映公众的政策偏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会在选举压力之下对民意可能的变动形成预期,进而做出相应的政策迎合。<sup>⑤</sup>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国会和总统的党派倾向变化后,美国在社会

①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② Meltzer, Allan H. & Richard, Scott F.,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9, No. 5, 1981.

③ 分别是有23个国家样本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和有47个国家样本的第三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

④ Mayda, Anna Maria & Rodrik, Dani,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6, 2005.

⑤ Stimson, James A., Mackuen, Michael B. & Erikson, Robert S., "Dynamic Represent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3, 1995, p. 543.

和国防等方面的政府支出仍可以显著地被公众的政策偏好所解释。<sup>①</sup>这种现象甚至在非普选产生的司法机构中都有发生，如研究发现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显著受到公众偏好的影响。<sup>②</sup>

在竞争性选举显得不那么重要的政治体之中，民意及民众对于特定政治类议题的态度是否也会对于政策制定过程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呢？已有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比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就探讨过民众可能用革命及叛乱作为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终极手段。<sup>③</sup>循着类似的研究路径，唐敏、呼和那日松和周强通过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假如威权型国家有太大规模的国有经济部分的话，此类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中更有可能发生政治联盟关系的重组，因为经济危机使执政联盟中主导的政治精英有动机剥夺执政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商业精英的地位，民意的反弹可能导致商业精英寻求与非执政联盟的普通民众结合为新的政治联盟。<sup>④</sup>

## （二）资产专用性、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与政治态度

当我们试图解释民意或政治态度的起源时，有一类文献认为人们的政治态度主要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所决定，也就是说，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所导致的阶级与阶层的不同可能是人们对于重大政治问题持不同态度的根源。

在这些传统的讨论社会经济地位的文献中，对资产的理解主要从所有权（asset ownership）的角度出发，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主要由资产所有权的不同衍生出来。如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劳工阶级，其政治态度与处于社会经济顶层的资本家阶级有鲜明差别。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处于财富维度两极

① Wlezién, C. & Soroka, S. N., “Federalism and Public Responsiveness to Policy,”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 41, No. 1, 2011.

② Enns, Peter K. & Wohlfarth, Patrick C., “The Swing Just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5, No. 4, 2011; 范世炜、杨文辉：《国际贸易与美国公众政策偏好的转向》，《公共管理评论》2020年第1期。

③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Tang, Min, Huhe, Narisong & Zhou, Qiang, “Contingent Democratization: When Do Economic Crise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1, 2017.

的人群的政治观点和可能的行为方式有重大的意义，但它也有自己的明显短板。如对于处在财富维度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人群（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人群的比重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纯粹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就显得单薄乏力。

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的不足就反映在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推动民主化的学术讨论中。尽管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已经是共识，但同一社会阶级内部同样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态度。那些延续了摩尔（Barrington Moore）<sup>①</sup>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sup>②</sup>观点的学者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推进民主化进程持积极态度，如作为中产阶级重要成员的中国法律人士通常有着强烈的追求政治自由与民主的倾向<sup>③</sup>；而持另一派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倾向于民主化<sup>④</sup>，且与国家政权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紧张会使其担心民主化导致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瓦解，损害其既得利益。<sup>⑤</sup>

其他研究者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发现在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对于公平、民主、政治支持等政治议题的态度具有较大的差异。<sup>⑥</sup>如李春玲认为中产阶级内部既有保守主义价值倾向，也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既有稳定器的作用，也存在民主化的倾向。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可以表现为安于现状、较高的政府信任与国家认同感、对社会公正期望较低。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多表现为希望变革、有更高的政治民主、追求社会公正与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再分配。<sup>⑦</sup>

这些关注同一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的研究大多使用调查数据来刻画不

---

①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② 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③ Li, Cheng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④ Chen, Jie & Lu, Chunlo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11.

⑤ Chen, Jie & J. Dickson, Bruce,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娄春杰：《中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⑦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

同人群的不同政治态度差异，并按照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客观差别将中产阶级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如将社会地位较高、具有更多技术禀赋或资本的人群划分为“新中产阶级”，或者称为“上层中产阶级”，而其他拥有较少资本与技术禀赋的人群被分为“老中产阶级”，或者“下层中产阶级”。<sup>①</sup>

然而，在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进行描述时，研究者们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更具有社会改造、社会变革意识，对于维持现有的组织稳定却并不热情。如张翼进指出，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愿意承担社会改造风险<sup>②</sup>；李春玲也认为新中产阶级更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表现为更希望变革、民主化以及对弱势群体进行再分配，而老中产阶级更具有保守主义倾向，更愿意维持现有组织稳定，对社会公正期望较低并认同现有的社会分配秩序<sup>③</sup>。但是，另一部分研究者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从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上层中产阶级倾向于反对更进一步的再分配。<sup>④</sup>盛智明也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提出，经历了向上流动或者预期向上流动的民众将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对现有政治经济格局有更高的支持，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他们能够从现有的制度和政策中获利，那么他们就倾向于维持现有的组织稳定。<sup>⑤</sup>

还有学者认为，按照客观经济标准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细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政治态度差异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与客观标准常常不能匹配，而主观的地位身份认知对其持有的政治态度有更直接的影响。<sup>⑥</sup>

此外，现有文献对同一阶级内部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解释也受到了阶级分析法的限制。由于现有研究采取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经济水平与社会身份地

①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③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

④ 潘春阳、何立新：《个人利益，分配公平与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

⑤ 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3年第4期。

⑥ 怀默霆 (Whyte, Martin K.)：《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崔岩、黄永亮：《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分析——兼议如何构建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橄榄型社会》，《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3期；李升：《主客观阶层位置与社会政治态度研究——兼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2期。

位对中产阶级进行更细致地划分,对出现组织稳定倾向、民主化倾向的政治态度差异的解释也局限于收入层次、社会流动性、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既然中产阶级内部的组织稳定与政治态度(如对于民主化的态度)存在巨大且难以说清差异,那么也就很难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政治态度做出严格的分野。与此同时,也缺乏文献说明除了中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内部是否存在较大的政治态度差异。

可以看到,大多数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文献,其立论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它们通常从资产所有权出发,然而却普遍忽视了资产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即资产的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这导致它们对于许多情形的理解和判断出现了不小的偏差。本文的贡献之处是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民众关于组织稳定与民主化态度的差异提出解释,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主观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认知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及它的政治意义。资产专用性指某种资产从一种使用形态转化为另一种使用形态的能力。通常的衡量标准是这种资产从现有形态转化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现金的能力。资产专用性越高,短期流动性越低。因此资产专用性与我们可能经常见到的另一个概念——要素流动性<sup>①</sup>——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高资产专用性等同于低要素流动性。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于要素流动性以及一系列与此概念相关的问题已有大量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经典文献。<sup>②</sup>比如在国际政治学的社会联盟理论中,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就会出现以阶级分化为基础和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研究路径。<sup>③</sup>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以及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model)均假设国内的要素

① 要素流动性指的是要素所有者拥有的将其生产性资产转移到国内各个部门的能力,也可以被称为跨部门或跨行业的要素流动性。最基本的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

② K. Hill, John & Mendez, Jose A.,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5, No. 1-2, 1983; Hiscox, Michael J.,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nes, W. R., "A Three 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in J.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London: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1971; Parai, Amar K. & Yu, Eden S. H., "Factor Mobility and Customs Unions Theor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5, No. 4, 1989.

③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

流动性足够高，故这个国家的社会联盟将以阶级为基础分化；与此相对，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假设国内的要素流动性足够低，从而导致社会联盟按照行业分化来展开。

众多的学者们研究发现国内要素流动性或资产专用性同经济发展<sup>①</sup>、国际贸易<sup>②</sup>、全球化<sup>③</sup>、国际收入再分配<sup>④</sup>、国内收入再分配<sup>⑤</sup>、国内政治制度的形成<sup>⑥</sup>、国内政治势力的重组<sup>⑦</sup>、资本主义多样性<sup>⑧</sup>等一系列问题有重大关系。自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资产专用性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 （三）资产专用性与组织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传统下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其基础之一就是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与维持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以及相应的交

① Przeworski, Adam, “Political Right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Seminars*, 2007.

② Stolper, Wolfgang F. & Samuelson, Paul A.,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No. 1, 1941; Jones, Ronald 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No. 6, 1965.

③ Frieden, Jeffr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Working Paper, 2018,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jfrieden/files/the\\_politics\\_of\\_the\\_globalization\\_backlash.pdf](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jfrieden/files/the_politics_of_the_globalization_backlash.pdf); Rodrik, Dani,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④ Milanovic, Branko,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in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Global Policy*, Vol. 4, No. 2, 2013; Frieden, Jeffrey A. & Lake, David 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⑤ Rickard, Stephanie J., “Broad versus Narrow: Explaining the Form of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5.

⑥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2001.

⑦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Ikenberry, G. John & Hiscox, M. J.,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⑧ 例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特征之一源自主流劳动力的技能类型以及专用性在各国间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体（LME）强调通用技能，劳工因此而发展出可方便自己流转于多行业岗位的技能；协调市场经济体（CME）强调行业专属技能，劳工因而发展出专属某行业的工作技能。Hall, Peter A. & Soskice, David,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ll &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交易成本有莫大的关系。<sup>①</sup> 资产专用性的直接导致了交易的发生过程中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大小。例如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会影响人们的投资决定，而持续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最终将塑造人们的政治利益。假如一种资产专属于某种用途，那么它的拥有者将会竭尽所能保证它继续用于此种用途，同时以转换它的用途为目的的交易将很难完成。而如果某种资产可以轻易地转换为其他用途，它的拥有者将不会激烈反对它的用途转换，这使得交易可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将关于资产专用性的洞见应用到各种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尝试屡见不鲜。比如，斯蒂芬·马吉（Stephen Magee）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有关国际贸易政策的听证会。他发现，代表了行业利益的游说团体充斥了贸易听证会，然而代表了跨行业利益的游说团体却屈指可数。马吉由此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美国，资产专属于特定用途的专用性远高于资产能跨用途转换的通用性。<sup>②</sup> 而这一美国经济特征的后果就是，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更倾向于维护某些特定行业的特殊利益，如航空业、信息业或农业，但对于跨行业的普遍利益却重视不够，如对于低收入劳工的工资待遇和失业人群的救济补助。在政治领域，当代西方有不少令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论者费解的现象。如在不少国家里，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劳工阶级却在政治上选择与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结盟（比如在美国南方许多州里，收入并不高的劳工阶级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在另一些国家里，劳工阶级并非总是站在与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近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的背后，而会去支持五花八门、背景各异的政党（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常见的多党联合政府）。<sup>③</sup> 在政治学者已经提出的众多解释之外，假如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在西方各国劳工群体的跨行业流动性（也即劳动力资产专用性的另一种叫法）有明显的不同

---

① Williamson, Oliv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② Magee, Stephen, "Three Simple Tests of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n Peter Oppenheimer (e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 Cork: Oriell Press, 1980.

③ Przeworski, Adam & Sprague, John, *Paper Stones: An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同<sup>①</sup>，而劳动力作为一种资产，它的资产专用性在各国间的不同与各国内部的政党政治生态差异有高度的关联<sup>②</sup>，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些所谓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著名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与资产专用性息息相关。<sup>③</sup>赫希曼对人们如何对待令自己不满意的组织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人们此时的反应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类，呼吁（voice）或退出（exit）。其中，呼吁指的是人们通过各种非暴力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希望通过这些表达推动组织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改变。而退出指的是人们用脚投票，通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自然，已经退出的人们同时也就丧失了直接影响组织的权利，也就是说，退出了的人们就不能再向原组织“呼吁”了。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若一位对组织不满的成员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则他将不太可能采取退出的方式，而更可能用呼吁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他没法很容易地脱离组织一走了之，因为这种退出的成本对他来说非常之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资产在此时把他变成了组织的人质，他的选择余地不再如没有资产考量时那么宽松了。但同样状态下若一位对组织不满的成员有很低的资产专用性，比如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资产变现并携带在身上，则他将很可能用退出而非呼吁的方式表达不满；低资产专用性降低了退出成本。<sup>④</sup>

退出成本的高低决定了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度，高的退出成本迫使

---

① Hiscox, Michael J.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2001; Cusack, Thomas R. , Iversen, Torben & Soskice, Davi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Origins of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3, 2007.

③ 艾伯特·O.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Hirschman, Albert O. ,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④ 艾伯特·O.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Hirschman, Albert O. ,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成员留在组织内部，客观上就促成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和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从政治组织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大面积的成员流失会带来组织的不稳定，那么使成员流失不会发生的特性自然是组织保持稳定性的保证。而从组织成员的角度来说，假如退出成本很高且短期无法改变，那么在继续“呼吁”以抗议组织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举措之余，成员同时会希望组织保持稳定性。因为只有组织保持完整才可能使成员们的依附于组织而具有价值的资产保持其价值，况且组织不稳定会带来一系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关于资产未来价值的大小、未来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未来组织的构建原则等），而不确定性正是任何资产所有者所厌恶的。

综上，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明晰的逻辑链条：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人们较高的退出成本→人们对组织稳定性的更多支持。

很明显，如果能找到一种普通人关心的且足够重要的资产，而且这种资产有较高的专用性的话，那么拥有这种资产与否将可能显著地影响普通人的政治态度，包括对组织稳定的支持程度。

本文认为房产就是一种这样的资产。我们不难发现对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房产是贵重的资产，一处房产可能凝聚着自己甚至家人数十年的辛勤积蓄，对于其价值的关注自然是应有之意。然而，房产的短期流动性又是很低的。从它的贵重和低流动性来看，房产具有专用性资产的鲜明特征，那么我们关于资产专用性的讨论就可以对涉及房产的相关问题有所启示。具体来说，套用以上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拥有房产会导致人们从现有社会组织中退出的成本升高，从而提升了人们对现有社会组织的支持度。

### **可检验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护组织稳定的倾向。**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社会就是我们必须时时面对的一个组织。对这个组织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的态度就成为我们对于本社会的政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将关注房产是否会对于其拥有者的政治态度有显著的影响。类似的关切，国外文献已有所涉及。比如有美国学者发现，国际贸易除了会如传统理论所述影响阶级或行业成员的经济利益之外，还会

通过影响国际贸易涉及地区的房产价值，进而影响人们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在出口行业蓬勃发展的地区，整体经济繁荣，房价上升，而使房主更支持国际贸易。在进口替代很多的地区，整体经济萧条，房价下降，而使房主更反对国际贸易。<sup>①</sup> 尽管政治态度与实际政策之间可能仍有较大的距离，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态度很可能影响并且指引政策的制定，政治态度与政策间有很强的相关性。<sup>②</sup>

#### （四）资产专用性与民主决策

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实践民主，以及实践什么样的民主，是世界各国都在持续讨论的话题。然而当我们剥开表象，追根溯源，民主的经济意义可以用以下这个简单却有概括力的模型来表述：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人民从最穷到最富依次排列，那么政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以某种方式来决定哪一部分的人群将会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sup>③</sup> 一般而言我们的常识是左翼的极权政府将把税赋重担压在富有的人群身上，而右翼的极权政府将把重担压在贫穷的人群身上。如果我们假设人人都有政治选择权，那么民主就意味

① Scheve, Kenneth F. & Slaughter, Matthew J., “What Determines Individual Trade-Polic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2001.

② Mayda, Anna Maria & Rodrik, Dani, “Why Are Some People (and Countries)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Oth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6, 2005. 尽管房产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然而将房产与政治或政策的分析结合到一起的尝试，在国际学术界也还是个较新的研究角度（经典论文例如 Scheve, Kenneth F. & Slaughter, Matthew J., “What Determines Individual Trade-Polic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2001）。就笔者所知，中国学术界较少有类似本文这种分析角度的文章，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房产作为商品出现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时间并不长。1979年中国第一处商品房住宅诞生，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商品房市场才开始逐渐兴起，房产的政治学意义可能渐渐才显现出来。二、作为本文核心概念的资产专用性应用在政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在中文学术圈才刚刚开始（例如周强：《补偿何时能换来对全球化的支持：嵌入式自由主义、劳动力流动性与开放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周强：《劳动力流动性的内生性：一个党派政治的解释》，《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而本文深入挖掘房产中蕴含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并进而分析其政治学上的意义，或许属于国内学界的第一批研究尝试。

③ Alesina, Alberto, Roubini, Nouriel & Cohen, Gerald D.,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着中位选民 (median voter) 将决定税收的政策。<sup>①</sup> 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 民主化是从少数富有的或有特权的人群垄断政治权力和政策制定权逐步转变到由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决策程序。在此过程中, 中位选民的位置将不可避免地由较富有向较贫穷的方向移动。由于中位选民决定的经济政策一定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则他们会在保持其他方面如税赋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税收, 同时增加对更富有群体的税收。因此, 对于富有的人群而言, 更大范围的民主决策意味着更多的且更穷的民众将进入决策过程中, 整体的社会政策将越来越向对于更穷的中位选民有利的方向移动。更大程度的民主化通常意味着对于自己资产价值更多的再分配, 所以除非他们在其他方面得到足够的补偿, 在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 富有的人群对于扩大民主决策的决策圈、引入更多的决策者、让中位选民更接近社会中位, 一般抱有敌视或反对的态度。大量的比较政治学文献与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sup>②</sup>

中位选民理论可以对于资产专用性和民主决策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启示。民主化以及更为民主的决策过程会导致决策更有可能由中位选民做出; 进一步民主化之后的中位选民将是更穷的人, 这导致其选择的政策将更倾向于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对于房产拥有者而言, 首先他们所拥有资产的专用性更高, 其次, 拥有房产本身使他们跻身社会中更为富有的阶层, 这两个因素相叠加使得他们更厌恶再分配性质的政策, 同时使得他们倾向于反对能够导致此类政策实现的社会条件, 如民主化。

通过以上的论证, 我们可以预见房产拥有者的政治态度将趋于保守, 他们将倾向于维持房产的价值并厌恶资产再分配, 以及对可能有助于形成资产

---

① Alesina, Alberto, Roubini, Nouriel & Cohen, Gerald D.,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Meltzer, Allan H. & Richard, Scott F.,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9, No. 5, 1981; Boix, Carles,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Boix, Carles,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cemoglu, Daron & Robinson, James 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再分配政策的政治民主化持保留态度。

## 可检验假说二：拥有房产会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

如同在许多国家一样，甚至在中国尤其如此的是，拥有房产几乎是证明房产拥有者是属于富有人群一员的标志。这个判断在北京尤其正确。2017年北京的房屋均价是57768元每平方米<sup>①</sup>，假定每一处房产的平均面积是70平方米，则此套房产总价值约为404万元，而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59660元<sup>②</sup>，北京人均GDP为128994元<sup>③</sup>，404万元分别是2017年中国人均GDP的约68倍、北京人均GDP的约31倍。显而易见，一套北京房产等同于一位普通劳动者数十年劳动价值的总和<sup>④</sup>，因而将北京房产的拥有者视为富有阶层的一员并不为过。那么我们关于拥有房产与对民主化决策支持度之间关系的预测，也应当能够反映在拥有房产的北京市民身上。<sup>⑤</sup>

## 三、实证检验

### （一）理论假说与数据描述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2017年度调查》（BAS2017），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开展，调查总体是2017年在北京市居住6个月以上、18岁及以上中国公民。调查采用了“GPS/GIS辅

① 《2017年北京房价》，安居客（<https://www.anjuke.com/fangjia/beijing201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

④ 这里以2017年为例是因为距离本文实证数据调查年份的2017年最近。

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大多数讨论资产专用性的政治学意义的文献来自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著述，读者很有可能留下资产专用性仅在西方（美国）政治制度下有效的印象，这些制度背景包括合法化的政治游说或竞争性的选举。笔者认为这是受思维惯性影响形成的错觉。资产专用性能够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既不囿于时代，也不囿于国家。资产专用性可以产生有意义的一般性的结果，而本文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是资产专用性政治学意义的体现的一个案例。类似的能够观察到资产专用性的政治意义效果的案例还包括，19世纪中期沙俄实行的农奴制改革提升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并深刻影响了俄国的政治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放松户口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作用，有力促进了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以单元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按照分层、多阶段的PPS（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方式进行选取，从而有效覆盖了北京市内的流动人口。从总体上看，数据的有效样本约2500个。

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我们选取BAS 2017年问卷中的问题“家庭背景不同的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机会也应该不一样。您是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还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来衡量受访者对维持组织稳定的偏好，并按照同意程度的递减排列，将受访者的回答分别赋值为4到1。可以认为，对这个观点的同意程度传达出受访者对维持现有组织稳定的偏好，认同程度高，则意味着受访者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从而希望秩序和稳定继续维持。将社会视为组织，房产所具有的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拥有房屋者面临着较高的退出成本，因而希望社会组织能够维持稳定，以使得房产价值能够得以保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假说一进行验证。

对于民主化决策偏好的衡量，本文选取问卷中的问题“穷人应该得到比富人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境况。您是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还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按照同意程度的递减排列，将受访者的回答分别赋值为4到1。对这个观点的认同程度高意味着受访者希望社会有平等机会，使底层人民或穷人也有发展机会，认为底层穷人也应该有政治决策权。而对于房产拥有者来说，穷人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意味着整体的社会政策将越来越向对于更穷的中位选民有利的方向移动，房产价值面临着被再分配的风险。因此，房产拥有者更有可能会对民主化决策持反对态度。<sup>①</sup>这是本文第二个待验证的假说。

---

① 本文的研究假设与选取的问卷问题可能被批评存在构念效度较低的问题，即问卷问题不能精准刻画本文所要研究的因变量。但是出于对敏感性等因素的考量，调查问卷在询问组织稳定与民主化决策相关的问题时不得不为了样本的有效性做出权衡取舍，牺牲了一定的构念效度。本文认为“家庭背景不同的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机会也应该不一样”在逻辑上与受访者对维持现有组织稳定的偏好具有一致的方向；“穷人应该得到比富人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境况”能够刻画出对该观点认同程度高的受访者希望社会有平等机会，使底层人民或穷人也有发展机会，在逻辑上与认为底层穷人也应该有政治决策权方向一致。

表1 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	占比	频数	样本数
组织稳定	非常同意 (4)	20.38%	476	2336
	比较同意 (3)	24.53%	573	
	不太同意 (2)	39.94%	933	
	非常不同意 (1)	15.15%	354	
民主化决策	非常同意 (4)	0.43%	10	2336
	比较同意 (3)	4.02%	94	
	不太同意 (2)	50.34%	1176	
	非常不同意 (1)	45.21%	1056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是否拥有房产，选用问题为“请问您家现在的住房是单位分的公房、买的单位公房，按商品价格买的房，自家私房，租房管局或私人的房，还是什么别的情况？”，将买的单位公房、按商品价格买的房、自家私房归纳为“有房产=1”，其余为“无房产=0”。

本文同时考虑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现代化理论及民主化理论都提到社会经济状况会对于人们的政治社会化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影响人们对于民主等政治事务的态度。<sup>①</sup>于是我们把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对于户口类型，我们将受访者的户口分为“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与“无北京市非农业户口”两类。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生活地位以及家庭生活状况在社会中属于什么水平。受访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1到10的量表衡量，分别表示由底层到上层。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将6到10编码为1，表示较高的社会地位，将1到5编码为0，表示较低的社会地位。家庭生活水平得分1到5分

① Lipset, Seymour M. ,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Glassman, Ronald M. ,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Chen, Jie & Lu, Chunlo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11.

表示由“低水平”“中下等水平”“中等水平”“中上等水平”到“上等水平”递增，在数据梳理过程中我们将 3 到 5 分编码为 1，表示家庭生活处于中高水平，1 到 2 分编码为 0，表示较低水平。

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展示在表 2 中：

表2 自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	占比	频数	样本数
房产	有房产	60.70%	1418	2336
	无房产	39.30%	918	
性别	男	43.58%	1018	2336
	女	56.42%	1318	
社会地位	高	82.27%	1921	2336
	低	17.73%	414	
生活水平	低水平	42.42%	991	2336
	中上等水平	57.58%	1345	
户口类型	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	69.86%	1632	2336
	无北京市非农业户口	30.14%	70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年龄	51.123	0.346	2336
受教育年限	10.865	0.076	2336

## (二) 实证模型与回归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将要验证两个假说：假说一，拥有房产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维持组织稳定的倾向；假说二：拥有房产会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本文的自变量“是否拥有房产”是由定类变量转化而来的虚拟变量，两个因变量“组织稳定偏好”与“民主化决策偏好”为定序变量，因此不能使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当自变量为定距或定比变量，因变量为定类或定序变量时，我们可以使用有序逻辑斯蒂（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

逻辑斯蒂回归能够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的变化会导致因变量的某一种属性的发生比的变化是多少。这里的发生比指的是事件发生的概率（ $p$ ）与不发生的概率（ $1-p$ ）之比。根据逻辑斯蒂函数：

$$p = \frac{1}{1+e^{-(a+bx)}}$$

$$\frac{p}{1-p} = e^{(a+bx)}$$

当我们对发生比的等式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将方程的右边转化为线性表达式：

$$\ln\left(\frac{p}{1-p}\right) = a + b_1x_1 + b_2x_2 + \dots + b_ix_i$$

此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x$  每增加一个单位时， $\ln\left(\frac{p}{1-p}\right)$  增加  $b$  个单位。即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的对数增加  $b$  个单位。但是由于我们无法解释  $\ln\left(\frac{p}{1-p}\right)$  中的实际意义，因此用发生比率（odds ratio）来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发生比率指的是当  $x$  增加 1 个单位时，新的发生比与原来的发生比之比。在有序逻辑斯蒂回归中，因变量为定序尺度。发生比率指的是当  $x$  增加一个单位时，因变量高于某水平与低于该水平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  $\exp(b)$  倍。

假设研究变量有 1 到  $j$  个定序的值， $x$  是解释变量的向量，那么研究变量的小于等于  $j$  和大于  $j$  的对数发生比为：

$$l_j(x_i) = \log \left[ \frac{\Pr(y_i \leq j | x_i)}{\Pr(y_i > j | x_i)} \right] = \alpha_j - x'\beta$$

其中， $i$  代表被访者的序号， $\alpha_j$  是估计的截点， $\beta$  是我们关心的房产变量的回归系数。从前述讨论可知，我们的期望是，在假设 1 中， $\beta$  显著为正，在假设 2 中  $\beta$  则显著为负。

为了检验房产对于组织稳定倾向与民主化决策倾向的影响，本文分别设

置了两个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3 是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模型 2 和模型 4 是加入了核心自变量房产之后的最终模型。

下表是通过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所得结果：

表3 有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组织稳定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组织稳定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民主化决策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民主化决策偏好 发生比 (标准误)
性别 (1= 男性)	1.1185 (0.0875)	1.1360 (0.0892)	0.9092 (0.0763)	0.9032 (0.0759)
年龄	0.9999 (0.0029)	0.9974 (0.0030)	1.0015 (0.0032)	1.0027 (0.0032)
受教育年限	1.0003 (0.0127)	0.9941 (0.0128)	1.0466*** (0.0149)	1.0494*** (0.0149)
社会地位认知	0.2893*** (0.0374)	0.2931*** (0.0382)	1.1401 (0.1281)	1.1346 (0.1274)
生活水平认知	0.6505*** (0.0516)	0.6369*** (0.0507)	0.8085** (0.0681)	0.8150** (0.0688)
户口类型 (1= 北京市 非农业户口)	1.6231*** (0.1602)	1.3882*** (0.1448)	0.7029*** (0.0708)	0.7536*** (0.0808)
房产 (1= 拥有房产)		1.5443*** (0.1389)		0.8221** (0.0777)
截点 1	0.0969*** (0.0265)	0.0929*** (0.0257)	0.0056*** (0.0024)	0.0056*** (0.0024)
截点 2	0.3228*** (0.0875)	0.3124*** (0.0856)	0.0592*** (0.0180)	0.0600*** (0.0182)
截点 3	2.5140*** (0.6754)	2.4561*** (0.6679)	1.5958 (0.4556)	1.6218* (0.4628)
N	2301	2301	2301	2301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seudo R2	0.0317	0.0357	0.0087	0.0098
Log pseudolikelihood	-2946.1013	-2933.819	-1953.9493	-1951.765

注:\*表示 $p < 0.01$ 的显著水平,\*\*表示 $p < 0.05$ 的显著水平,\*\*\*表示 $p < 0.1$ 的显著水平

对比模型的伪确定系数(Pseudo R2)可以发现,模型2和模型4的解释力优于模型1和模型3,这表明加入房产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

在模型2中,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对组织稳定偏好没有显著影响,在95%的置信水平下,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自我认知更高的民众更不倾向于维持组织稳定,而拥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更倾向于维持组织稳定。是否拥有房产对人们的组织稳定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拥有房产的组织稳定偏好的发生比是没有房产的1.5443倍,这里的发生比指的是对组织稳定的偏好程度是大于3还是小于3、大于2还是小于2的概率之比。此时的发生比率 $1.5443 > 1$ ,意味着有正向的影响,说明了拥有房产的民众更加倾向于维持组织稳定。这与我们的假说一相符合。

在模型4中,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认知对民主化决策偏好没有显著影响,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受访者越具有民主化决策偏好,认为自己生活处于高水平的民众比认为生活处于低水平的民众更不具有推动民主化决策的偏好,拥有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民众比没有的民众更不具有推动民主化决策的偏好。是否拥有房产对人们的民主化决策偏好有显著的影响,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拥有房产的民众民主化决策偏好占没有房产民众的82.21%。此时的发生比率 $0.8821 < 1$ ,意味着负向的影响,这反映了拥有房产会导致民众更不愿推动民主化决策。本文的假说二得到了检验。

## 四、结论

围绕着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本文对公民政治态度的来源，尤其是他们对社会政治秩序保持基本稳定的偏好，和对于公共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偏好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并以房产作为专用性资产的典型对《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度调查》（BAS 2017）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的分析发现，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之下，拥有专用性资产（如房产）能够显著地提高人们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偏好；同时，拥有专用性资产如房产会降低人们对民主化决策的支持程度。这些发现验证了我们通过一般性理论探讨得出的假说。

而即使是在本文实证数据之外的经济体之中，我们认为本文的理论依然有相当的普适性。一个我们熟悉且刚刚发生的比较案例就在香港和新加坡。我们知道，自 2019 年 6 月起，香港因“修例风波”不断蔓延、激化而爆发了示威乃至暴乱活动，其间对于社会秩序和公共物品的破坏令大多数中国人深感痛惜和错愕。本文的理论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作为此次示威和暴乱活动主力的香港年轻人如此激烈地损坏公共物品和冲击香港的社会秩序。仅举一些简单的数字：在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从 2004 年的 54% 下滑到 2017 年的 49%，人均住房 16 平方米<sup>①</sup>，而在 2004 年和 2017 年，香港的人均 GDP 分别是 24 928 美元和 46 225 美元，房屋均价在 2017 年是约 27.9 万港元 / 平方米（约合 3.6 万美元 / 平方米）。考虑到年轻人的起薪通常会低于社会平均薪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大概率不拥有自有的房产。

反观新加坡。一个让新加坡人自豪的事实是新加坡 2007 年便已实现自有住房率 90.7%，81% 的人口都居住在政府建设并廉价卖给市民的组屋中，人

---

① 夏磊地产观察：《高房价之困——香港住房制度反思（上）》，2018 年 11 月 7 日，搜狐新闻（[https://www.sohu.com/a/273739430\\_467568](https://www.sohu.com/a/273739430_467568)）。

均居住面积 30 平方米。<sup>①</sup> 已成为“房产所有者社会”的新加坡与香港相比，其社会的稳定性显而易见。从本文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普遍拥有贵重且有专用性的房产的新加坡民众，比起普遍不拥有自有房产的香港民众（尤其是香港年轻人），会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及更排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化。

资产专用性自然是不仅限于房产才具有，而且资产专用性的后果也不仅限于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前文中已经提到资产专用性还可能对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经济政策，甚至选举制度、政党形态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及其与资产专用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待于通过学者们更多的相关研究来推进。

---

<sup>①</sup> 夏磊地产观察：《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录：新加坡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2018年9月21日，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09-21/doc-ifxeuwwr6618541.shtml>）。